

地方化的空间：大行与亳州的互构

傅琦*

前些年，由郭宝昌执导的《大宅门》在央视热播，火爆一时。剧中，白景琦跟随涂、许二人安国办药是极其精彩的一幕。而其中，涂二爷所说的，“咱们白家的人不到，药材市场就不能开市”的场景更是让人印象深刻。“同仁堂不到不开市”堪称是一种文化传统。早在清雍正年间，国内的领衔药市便有了这个约定。^①如今，同仁堂到，药市开市的规矩依旧保持着。只是开市的地点，不再是《大宅门》中提到的安国，而是亳州。2003年，北京同仁堂集团在对中国的四大药都进行反复遴选后，最终确定在亳州市中药材交易中心举办开市仪式。^②自此，每年正月，北京同仁堂集团都与安徽省亳州市政府联手举办药市开市活动。中断百年的“同仁堂不到不开市”的传统也由此得到了延续和传承。

然而，在感叹传统复归的同时，笔者又不免心生疑问：尽管亳州药都文化历史悠久，但却并非自古以来一直位列国内药都之首。亳州何以能从百泉、樟树等药市中脱颖而出，替代安国，成为国内领衔药市？其药都地位究竟是如何得到稳固发展的呢？关于市场，社会学更多是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切入；而人类学则倾向于将市场视为整个社会或文化的一部分，关注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对以上问题的思考中，笔者渐渐关注到空间（space）与地方（place）两个概念。在笔者看来，空间与地方虽然有所不同，但是绝非对立。脱离空间看地方和脱离地方看空间一样，都是对空间或地方的不完全审视。既然任何地方的市场活动都发生于一定的空间中，空间和地方两者间又互相交融，那么，我们就有必要从空间与地方的互构角度进行切入，对市场进行审视。本文将首先对已有关于空间与地方的相关研究文献做一简要回顾；其次，分析地方化的空间所历经的由自为到他为式的转变，以及大行设立后，引发地方市场的场内、场外之别；再次，分析地方如何利用场内空间积聚象征资本，以实现地方的发展。最后，本文将对空间与地方互构中折射出的空间的生产问题进行讨论。



亳州中药材集散中心（俗称大行），傅琦摄于亳州

* 南京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① 见《“同仁堂不到不开市”百年传统亳州传承》，<http://www.tongrentangbz.com/sitecn/mtjj/477.html>。

^② 同上。

一、“空间”与“地方”

长期以来,虽然同是作为两种解释人类社会生活的维度,空间并未如时间一样,受到人们的重视与优待。早年,空间要么被视为是一切生成的载体(柏拉图语);要么被视为是呆板的、固定的、非辩证的、不变的(福柯语)。这样的认知必然会使空间沦落至为人们所忽略的境地。直至20世纪下半叶,在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索佳(Edward W. Soja)等一大批学者的共同推动下,空间的缺场状态才开始有所改观。空间被发现是如此重要,一如苏贾在《后现代地理学》中所指出的:“我在此重复伯杰发人深思的结论:对事物的预知现在牵涉到地理的投射,而不是历史的投射;藏匿各种结果使我们无法看见的,是空间,而不是时间。”^[1] ^[p36]空间转向愈演愈烈。这种汹涌澎湃的浪潮使得空间(space)与地方(place)的关系议题,再次被拉入到人们的视野中。社会科学领域在20世纪90年代时,出现了对空间和地方议题的兴趣复兴。^[2] ^[p1]

什么是空间?什么是地方?两者有何关系?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两者基本上可以通用。^[3]但是,对于Phil Hubbard等一些人文地理学家来说,它们既相关又相互区别。在Phil Hubbard看来,尽管空间和地方两个概念表面上看起来不需要加以说明,但是实际上,它们的含义一直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最不明确的。在日常生活中,空间和地方经常被与环境、地区、场所、区域和景观同义使用。但是大多数人文地理学家都在努力区分二者。^[4] ^[p41]

虽然不是一个人文地理学家,吉登斯也很强调空间和地方这两个词的区别。“在前现代社会,空间和地点总是一致的,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生活的空间维度都是受‘在场’(presence)的支配。现代性的降临,通过对‘缺场’(absence)的各种其他要素的孕育,日益把空间从地点分离了出来,远离了任何给定的面对面的互动情势。”^[5] ^[p16]所以在吉登斯那里,空间和地方,亦即缺场和在场。现代社会时空伸延。不仅时间与空间相分离,而且空间与地方也相分离。

与吉登斯强调时空伸延不同,作为马克思城市空间理论的三剑客之一,^[6]大卫·哈维强调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交通技术的发达,以及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等,都深切地改变着资本积累的方式;也深切地改变着人们对时空的体验。哈维将这种改变概括为时空压缩。时空压缩是否会消除地方?哈维在反驳吉登斯对地方的看法时,也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一如陆扬所说:“哈维为地方辩护,指出地方同样具有形而上的意义,而不仅仅是人际直接交流的地方。”“世界在趋同即空间化的过程中,也同样是在不断分化、异化,或者说地方化。”^[7]空间与地方的关系,盘根错节。

如果说,上述学者在论及空间与地方时,尚能视两者为共生的、不分“等级”的关系,曼纽尔·卡斯特尔则在把空间划分成“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和“地方空间”(space of places)的同时,把两者决裂开来,使之成为支配与被支配的两极关系。在卡斯特尔看来,“流动空间是相对于地方和本土的国际化、全球化空间。地方空间,是其形式、功能和意义都自我包纳在其物理边界之内的空间。”^[8]全球化下,资本具有了高度的流动性,不再受地方的牵绊。因而,流动的空间是拥有权力和财富的、典型的全球化精英空间。传统的地方空间则因此,被新生的流动空间所取代,所支配。^[9]卡斯特尔的这种二元对立观可能产生的一个后果,早已被艾少伟和苗长虹陈述清楚,那就是人们在对流动空间——这个具有能动性的、大权在握的霸权空间过度关注的同时,会在理论上边缘化“不流动”的地方。^[10]

受现象学、存在主义等哲学思潮的影响,学者们除了关注空间和地方所具有的政治、经济特性外,还开始关注其所具有的经验特性。人文地理学家 Yi-Fu Tuan 就从人地关系角度出发,阐述了自己对空间与地方的理解,强调地方所拥有的心理内涵。在他看来,地方与空间是相对的概念。空间特指地理位置和物质形式等;地方则包括了物理环境、人类活动和心理意义等三种成分。地方的主要功能在于促使人们产生归属感和依恋感。^[11]他还提出“场所依恋”(topophilia)和“场所恐怖”(topophobia)两个概念,用以揭示人们与特定地方相联系时所产生的欲望和恐惧的情感。Yi-Fu Tuan 的研究使地理学家开始关注空间的感觉、美学和情感维度。^{[12][p42]}人们对空间的理解继而也更加丰富起来。

在上述学者的研究中,空间不再是一个外在于人的物理空间,一个“容器”,而是社会空间。虽然据美国人文地理学家巴特马(Anne Buttimer)考证,作为概念的“社会空间”一词最早是由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在19世纪末创造和应用的,^[13]“社会空间视角”却是直到1995年,由M·Gottdiener和R·Hutchison在《新城市社会学》一书中首次提出,用以强调对空间象征性的关注。^[14]受此启发,本文力图从大行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出发,探讨空间对宏观社会过程的影响。本文认为:空间不是单纯的自然性存在,空间是地方化的空间。对于亳州而言,大行的设立有其独特的历史基础与现实需要,与其地方特质一脉相承。大行引发的场内、场外之分,及其各自所具有的特质、功能,皆是亳州地方性的彰显。地方是对空间的建构与利用。场内与场外是两类空间。亳州药都地位的稳固与发展,有赖于场内,也就是大行对象征资本的积聚。场内积聚象征资本,场外搭场内的便车,这即是亳州药都经济的运作逻辑。亳州药都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是种空间的生产。

二、由“自为”到“他为”:空间生成方式的转变

在德塞图(Michel De Certeau)看来,场所(place)与空间(space)不同,它是没有生命的物质性存在体;而“空间是被实践了的场所”。因此,当人类在一个“场所”内涉入了主观性的行动时,就驱动了“空间”的产生。^[15]从这个意义上说,老亳州城的里仁街一带,至少早在明清时期,即因为药商们的行动涉入,由地方转变为了一个特殊的空间。然而,这种因药商自为式聚集而形成的空间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因为“大行”——这个被刻意创造出来的物理空间的设立而发生了改变,转变为一个他为空间。按照德塞图的看法,空间总是与人类的行动和历史有关。^[16]国家干预行动的卷涉,导致空间生成方式的改变。这必将导致空间的性质、功能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一点,我们在文章的后面会看的更清楚。因此,空间永远都是地方化的、具体化的、历史性的。^[17]

自为空间就是指依靠主体自发聚集而形成的空间。历史上,亳州药市格局的空间分布,一直呈现出一种以地理条件为基础的自为式聚集样态。地处中原,素有“南北通衢,中州锁钥”之称的亳州有着悠久的药材种植及购销历史。清初时,种药农户就达到了2000多户,乡间种植“以顷亩论”。^{[18][p137]}清人刘开有诗曰:“小黄城外芍药花,十里五里生朝霞。花前花后皆人家,家家种药如桑麻。”药材之乡,再加上涡河水运上达汴京,下通沪宁,亳州早在明代即成为全国闻名的中药材集散地。至清朝中叶时,亳州即以其中药材种植、加工和商贸规模较大,历史悠久,被冠以“药都”的美誉,并与河南禹州、河北安国、江西樟树一起,并

称“四大药都”。^①

始建于春秋时期的老亳州城有四个城门。其中，北门口外向北至涡河之间的区域俗称“北关”。老亳州城的城区即由城里、北关和涡北（涡河以北）三个部分组成。亳州城里是政治文化中心。北关则因临涡河之滨，交通便利，成为当时的商业经营中心，是老亳州城最繁华的地带。涡河上桅杆如林，帆船如织。北关一带众商云集，会馆林立，人口远超过城里。亳州过去之所以享誉“小南京”，全赖于北关经济的繁荣。

北关老商业街的最大特点，是同类商品多聚集到某一街、一巷，因而形成了一物一街，一品一巷的商业专业市场格局，如爬子巷、帽铺街、纸坊街等。据记载，明清时期，药材生意多自为聚集在北关的里仁街、纸坊街和老花市三条街上。里仁街总长约 300 米，宽 5 米左右。该街设药号、药行 30 余家。街道两旁的铺面几乎都是大商铺，以贵重细药，大宗交易为主。上至犀角，下至枯草，贸易量之大，交易范围之广，非一般商号所能及。^{[19][pp54-55]}老花市街位于里仁街西头向北拐弯，该街设药行号 10 多家，多为一般经营。纸坊街位于里仁街西头向西，清代中叶时演变成药材街。^{[20][p39]}由此，以里仁街为中心，加上附近的几条街上分散的交易场所，就形成了当时的药市格局。清朝末年，亳州药市因战乱走向颓败。民国初年有所好转，仍以里仁街为中心。民国十年后，因孙殿英祸亳，加之抗战爆发，药商们元气大伤，药市从此一蹶不振。^{[21][p55]}1949 年之后，政府推行计划经济，药市的命运可想而知。及至改革开放后，低迷的药市才重新崛起。地方政府看上其隐含的价值之后，设立大行，亳州药市便由自为式聚集转变为他为式聚集。

“大行”是亳州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才有的词汇。所谓他为空间，是民间对由政府或其他集团出资设立而形成的中药材集散市场的俗称。既然亳州药市的格局历来都出自于药商们的自为式聚集，那么，究竟是在一种怎样的历史背景下，政府干预了药材市场的运作，设立了大行呢？说起来，这和改革开放后亳州药市规模迅速扩大引发的市场混乱直接相关。那么，为什么亳州的药市规模会在改革开放后迅速扩大呢？谈及亳州何以能从众药市中异军突起时，作为建国后第一代药商，笔者的一位报告人，詹老伯，同许多药商一样，给出了如下解释：

“你可知道亳州这个地方是咋发起来的这个药材市场？我一说，就给你从历史上说起。华佗是亳州的，这个你知道吧？亳州也就是受华佗的影响。受华佗哪的影响呢？亳州产几大药材，白芍是一个，全世界有名。白芍从华佗那个时候起就开始种了。这个亳州药材市场的发展就是从白芍上来的。”

白芍又称“亳芍”，是亳州市市花，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仅有的被冠以“亳”字的四大药材之一。白芍是亳州的大宗特产，属多年生药材。据《亳州市志》上记载：清末

^① 目前，国内有 17 大中药材专业市场，但是只有其中四个药市被冠以药都之称。关于四大药都说不一。除文中所述说法外，还有两种说法，认为四大药都为：安徽亳州，河南禹州，河北安国，河南百泉；或安徽亳州，河南禹州，河北安国，广西玉林。17 大药市分别是：1. 安徽亳州市场；2. 广东清平市场；3. 广西玉林市场；4. 河北安国市场；5. 江西樟树市场；6. 河南禹州市；7. 四川荷花池市场；8. 陕西万寿路市场；9. 湖南廉桥市场；10. 广东普宁市场；11. 重庆解放路市场；12. 云南菊花园市场；13. 甘肃黄河市场；14. 山东舜王城市场；15. 湖北蕲州市场；16. 湖南花板桥市场；17. 黑龙江三棵树市场。

时，白芍常年产量约为 300 万斤。民国初期，白芍的产量为 100—200 万斤。日寇陷亳后，白芍价格一落千丈，农民均弃植。至建国前夕，年总产量仅有 10 万斤。建国后，在政府扶持下，白芍生产才得以恢复。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 年），药材生产停滞。1963 年，国家对药材生产实行奖励政策，规定出售一市担白芍奖励粮食 65 斤、化肥 60 斤、棉布 4 尺，从而调动了药农生产积极性。1966 年，白芍总产 384 万斤。此后几年中，白芍生产失控。1971 年，总产达到了 1600 万斤，市场滞销，积压严重。^{[22][pp138-139]}

这白芍已然积压严重了，又怎么说亳州药市的发展是从白芍上来的呢？据詹老伯讲，那时候大家确实都在种白芍，因为大家都想搞经济。结果，产量大，种了卖不掉了。当时，白芍只能卖到两毛七一市斤。由于 1953 年起开始实行的统购统销政策规定，凡是贩卖国家禁止私人经营的一、二类农副产品的（白芍被列为二类），均被定为是投机倒把非法行为，好做点小生意的詹老伯就只能偷着和另外两个胆大的朋友一起，带上五六十斤的白芍，打个自产自销证，前往甘肃詹老伯的堂哥那尝试寻找出路。三人从商丘出发没多远就叫人撵下了火车。好在药材没有被没收。于是三人继续努力，通过扒火车，来到了甘肃的天水。在水的一家医院里，两毛七一市斤的白芍卖到了一块二一市斤。兴奋之余，三人从甘肃返回时又捎回来一些党参。在河南鹿邑，五毛钱一市斤的党参被一家医药公司以两块钱一市斤的价格全部收购。三人得了钱，兴高采烈地回家了。不幸的是，刚进家门就被生产大队给逮住了：搞投机倒把，劳动半个月。好在收益所得被詹老伯的谎言保护下了，没被没收去。

虽然这只是詹老伯等几个人的经历，但是这确实反映了当时地方上发生的实际情况。若不是因为亳州当年白芍大量滞销，就不会有大批药农冒险外出销售。他们带着亳州的白芍跑向全国各地。卖了白芍，再买些当地的药材跑回亳州卖。没开放以前，人们偷着跑，偷买偷卖。改革开放后，人们明着跑，明买明卖。不管怎么跑，一个人跑得富裕了，必然会带动他的亲友、邻居也去跑。一带十，十带百，亳州慢慢地，先于其他地方，形成了一个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说，亳州药市的发展，确实可以看做是由白芍带动的。这些当年曾遮遮掩掩，躲躲藏藏地游走在祖国大江南北的药农，因为销路的掌握，后来多数都专门从事药材生意。用詹老伯的话讲，亳州现在的那些有钱人，那些有大钱的人，都是那个时候跑发起来的。比之于其他省市的商人，亳州药商早早地就被“逼”向全国各地。他们在与各地医药部门建立联系，开拓销路的同时，也在为亳州药市日后的发展积累了资本。

改革开放政策落实后，因为有前期跑药积累下的关系，亳州药商们也放手大干了起来。亳州的南关、北关、西关、东关，到处都有药商们聚集卖药的身影。当时的药材市场上，坐商据店经营，客商及农民多临街设摊。他为之聚集导致存在“集外集、行外行、门外店、店外摊”的混乱局面。在詹老伯看来，政府盖这个大行就是出于解决当时药市混乱的考虑：“改

革开放了，这时候，好，亳州人有种了，都拿出来搁路边上卖了。路边上卖城管的管啊，那

时候叫市管会不叫城管啊，影响交通也不行啊，你不是乱吗，自然形成的市场，给你规范，

盖一个市场，叫人都撵到这里边去。”但是实际上，管理的需要只是政府考虑的一方面，经济利益的驱动才是主要的。改革开放后，由于中央对地方的垂直控制有所放松，地方政府开始变得在经济发展中积极主动起来。布雷切尔(Blecher)称这种现象为“地方开发国家”(the local

developmental state, LDS), 戴慕珍 (Jean C. Oi) 则称其为“地方国家法团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 杜基 (Duckett) 则认为地方政府直接进行商业性投资和涉足有风险的经营性活动这类事实已经构成一个“国家经营主义”模型 (state entrepreneurialism)。^{[23][pp74-75]}也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亳州县政府出于地方发展的需要, 为了把亳州的药材优势打造成同贡酒优势、桐木优势、烟叶优势、文化古城优势一样的经济优势, 对方兴未艾的药材市场给予了大力支持。在郊外 (即现在亳州老商贸城所在地) 投资 3800 万元, 兴建了占地 5.8 万平方米的中药材大世界,^{[24][p166]}民间始称之为“大行”。

三、场内与场外: 空间对地方的区分

大行的出现结束了亳州历史上, 药材市场一直以来的自为式存在样态。药商们被“赶”进大行, 购买摊位号, 统一经营, 接受政府的统一管理。然而, 大行的作用并不仅于此。从个体经营角度而言, 大行对地方发展的贡献在于它使过去浑为一体的亳州药市有了“场”的概念, 以及场内、场外之别。场内和场外皆具亳州的地方特质, 与亳州的历史传统一脉相承。

作为一个物理空间, 大行即是“场”。场内就是指大行内。大行也是对中药材交易中心两期工程 (包括交易大厅和大行外围的复式店铺) 的统称。就个体经营而言, 大行里的交易就是场内交易。反之, 那些不属于大行范围的自在聚集区域则是场外。发生于其中的交易就是场外交易。场内与场外, 也是两类性质不同的空间。

如今, 场内有样品行和摊位行两种类别。其中, 样品行在大行设立之初并不存在。其设立是出自政府的一种无奈之举。95 年, 大行进行了第一次搬迁。然而, 由于地理位置偏远, 摊位费相对较高, 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进入到这个新的空间中来, 很多药商就携一点样品在场外游击、寻找买家, 其样品展示和销售行为日趋严重。对此情况, 当时的市政府决定予以整治。表面上看, 当地政府对场外市场的整治和取缔, 是对药市秩序以及城市形象的维护, 实质上却是一种驱赶, 旨在维护其既得利益。正如王华分析南京安德门劳务市场的成立一样, 经过几轮的整治和清理后, 当时的亳州市政府无奈地意识到了一味“追堵”的无效性。^[25]药商们在城区与管理人员“打游击”, 曾一度到谯城区十九里、五马镇等地经营。最远时, 数千人每天到河南鹿邑与谯城区十八里镇交界处交易。无奈之下, 鉴于当时新落成的大行交易大厅的二楼空闲摊位较多, 经过研究, 亳州市才决定在二楼专门设立样品行。^①

样品行只走大货, 不零售。药商展出的, 也是装在塑料袋中的一袋袋样品。于是, 下面这则发生于买家和卖家之间的对话就具有了典型性:

“xx 多少钱?”

“50。”

“少了呢?”

“你要多少?”

^① 见《亳州中药材场外交易到底该怎么管 根治方案正在酝酿中》, <http://www.zgyccsc.com>, 2007-03-16。

“要个几百斤。”

“给你算 49。给你名片，家里看看去吧。”

样品行出售的既有药材个子，也有中药饮片。行里仅是看货询价，并不发生实质性交易。买家若是遇上中意的货源，要么按照卖家提供的名片上门看货，买货；要么就在便签条上写下联系方式，药材的需求数量及送货地点交予卖家，俗称开条。下行后，买家只需在家等候即可，卖家自会凭条携货而至。验货过关后，付现或是打欠条，发生实质性交易。

样品行被“招安”的过程充分说明了场内、场外空间性质的不同。因为场内是由政府牵头修建的，由政府负责统一管理，所以场内天生具有合理性的资质。反之，那些场外市场，如马园、斯达特、谯奥；白依路等，则因为不接受政府的统一管理，甚至没有得到政府的认可而成了原则上，地方政府予以整顿、查处的对象。

场内只是个成品的交易平台，成品的加工环节自然就只能发生在外，例如中药饮片的加工。按照有关法规，中药饮片的生产资质非常严格，未取得生产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均不能进行加工（切、炒、炙、磨粉等）。国家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反复强调，在药材交易中心这种农贸市场性质的交易场所内，除了 73 种饮片外，禁止经营其他中药饮片。然而，饮片加工却一直是亳州药市的一大特色。一个老药商就曾对笔者说，亳州的经济活就活在饮片上。饮片垮，亳州经济就得垮。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据《亳州市志》记载，早在明清时期，亳州中药材的破碎、炮制就已十分兴盛。炮制业还有以南京为代表的“南派”，以开封为代表的“北派”和“当地派”三个派别。民国时期，还涌现出张俊才、陈子英、许登云等一批炮制高手。80 年代初药材市场开放后，个体加工户竞相开业。至 1986 年，仅市区加工户就达 2931 家，乡间自产自加工户多达 3 万多家，其中近百家采用机械化生产，集切片、炮制于一体。^{[26][p140]}20 世纪 90 年代初，亳州市逐步形成一批药材加工专业村。1993 年，从事药材粗加工的专业村就达到了 350 个，个体加工户近 3 万户，从业人员 15 万人，年加工能力 40 万吨，年加工净产值 5 亿元。^{[27][p165]}

亳州药市的运作无论是从其传统的空间生成方式上看，还是从经营方式上看，一直以场外为主体。只不过，因为过去没有“场”，也就无所谓“场”的内外之别。我们还可以透过当下大行的运作节律，对作为亳州药市运作主体的场外空间有个更加感性的认识。

时值 6 月，每天早上七点半左右，大行大门洞开，药商们鱼贯而入，开始上行。除了样品行外，大行里还有一类摊位行。与样品行不同，摊位行既批发又零售。各摊位的面积也较为宽大。一般来说，摊位行里如果买家买的货相对较多时，卖家也会在下行后，亲自送货上门。那么，卖家何时才能下行送货呢？

时针指向八点五十时，样品行里就开始骚动起来。药商们一边和人拉呱，一边逐个将样品袋的袋口扎紧，塞进木板下面的小铁箱里。收好木板、板凳；上锁。九点刚过，药商们又鱼贯而出，下行了。九点下行还算晚的。药商们告诉笔者，天再热些时，样品行八点半就没人了。摊位行下行的时间晚些，但也不过十一点前后。遇上药市的淡季，生意不景气时，早在十点半，摊位行的药商们就下行了大半，十一点时几乎人去楼空。即使冬季上行时间略有推迟，样品行上行的时间也同样最多不过一个半小时左右。如果能从空中俯视亳州，你会发现早上，人们陆续从四面八方涌来聚拢于此。仅仅一个半小时以后，人们又从此中心陆续四

散而去。有人说：“数千人一下子散去哪了，不是回家了，而是去场外交易去了。”下行后的亳州街道上，到处可见送药的三轮车来来往往。一派繁荣兴盛的景象。有些走药（向外地医院或药厂交药）的药商，甚至无需上行，只消打上一通电话，药材就会在下行后的时间里，被络绎不绝的送至家里。这样一来，样品行均是进行场外交易。摊位行也有部分的交易是发生在校外。校外即是亳州药市运作的主体。

因此，作为一个他物的物理空间，大行的设立使浑为一体的亳州药市出现了场内、场外之别。场内天生具有合理性，但是它只是一个认识客源的平台，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场外过去是亳州药市运作的主体，现在依然是。只是其性质由合理转变为了“没理”。“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这样一来，以“没理”的场外为主体的亳州药市，又是怎么稳固和发展了其药都地位的呢？

四、象征资本的积聚：地方对空间的利用

要想稳固亳州的药都地位，必须使之得到认可和重视。“按布尔迪厄的看法，被认可或被重视是一种象征资本，而象征资本则是一种权力，一种以某些合理要求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让人难以觉察到的权力。这些要求是他人的欣赏、尊重、敬意，以及提供其它服务等等。”^[28]与可以量化的经济资本不同，象征资本难以计算，表现为一种象征性。“当它通过被强加的感知范畴所认知之前，它还一无所有。”一如范可在对百崎回族乡政府发起的，一系列旨在令百崎为外界所知，并留以强烈印象的建设发展项目的分析中所指出的那样，亳州地方政府也充分理解“为人所知”在商品经济中的意义。在这样一种潜规则的指导下，政府发起的一系列措施的目的，都在于为市场服务，提高当地的经济总量。^[29]

只是，鉴于场外是“没理”的，获取象征资本，稳固亳州药都地位的重任，自然就落在了场内的身上。场内的空间功能由此发生了变化。它不再只是一个药商口中的交流平台和寻洽机会的平台，它更是一个积聚象征资本的载体。地方是对空间的有意义建构。地方就是空间化的地方。在政府干预下，场内，也就是大行自身，变成了一个象征物。正如拉德克利夫一布朗（A.R.Radcliffe-Brown）在《禁忌》中所说：“凡是有意义的东西就是一个象征，而意义恰恰是象征所表现出来的东西。”^[30]大行的意义就在于，它是合理性的象征。地方经由对大行空间形象的建构、差异形象的弥合，完成了对象征资本的积聚。

要想获得认可和重视，积聚象征资本，首先要完成大行空间形象的建构。这个过程中，指向他者的外部空间形象的建构尤为重要。这是因为和一个人的身份一样，形象本身就包含有“他人取向”的含义。形象产生于各主体间的互动关系之中，不存在一个单一的或纯粹的形象。形象唯有倚赖他者的眼光，才能真正得到完成。^[31]外部空间形象的建构主要是依托三次搬迁建构起来的。

第一次搬迁是在大行落成后进行的。如上文所述，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行成立。四散于城市各角落的药商们，搬迁至一个固定空间内，服从统一管理，统一经营。以此空间为中心，辐射周边地带，形成当时的药市格局。虽然此时，大行吸聚象征资本的效用尚不明显，但是因为它的建立，转变了亳州药市自为的传统运作模式而意义深远。及至20世纪90年代初，大行的空间局促性愈发明显。当时，大行拥有的4000多个摊位都拥挤在狭小的空间里。

一个药商曾对笔者说：“什么是蹲行？我告诉你什么是蹲行。就是空间太小，没坐的地方。大

家都在那蹲着，就叫蹲行。”虽是药商的戏谑之语，却也能折射出当时市场发展受到空间钳制

的事实。为了巩固药都地位，进一步扩大药都亳州的影响，亳州市与珠海华侨置业公司于1994年，兴建了“中国中药材交易中心”。^①这一次，新大行的设立上报了国家，并获得了来自国家医药管理局、国家工商局、国家卫生部的批准。除了获得了中央的认可，这次兴建的大行还是国内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大行占地300亩，投资3亿元，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有700套复式铺面房，集商、住为一体；3.2万平方米的交易大厅分为上下两层，已安置摊位6000多个。一期工程于1995年9月建成并投入使用。^②亳州历史上的第二次大搬迁就此拉开序幕。

新大行投入使用后不久，即因其规模宏大，以及是国内最早实行“公司化”运作的药材交易市场之一等缘由，被定为样板在全国推行。亳州声望飙升。为大行空间形象添灯加彩的事件，是1995年，江泽民总书记亲自为亳州大行进行题词：“华佗故里，药材之乡”。这个题词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它出自中央领导人之手，充分表示了国家话语对亳州的认可；在一些药商的认识里，它甚至成了亳州药市的“保护伞”：“前些年，暗访记者把亳州的假虫草给曝光

后，要不是有江泽民的题词，大行估计就得关门了。有了题词就不一样啦，这是中央认定的，

不能让它说倒就倒。你现在关了它，你不打自己嘴巴吗？”除此以外，重要性还表现在它本身

就是一个象征资本。那块刻有题词的巨石，至今都还摆放在大行正门入口的显眼处以供人们瞻仰。当然，同时接受瞻仰的，除了规模宏大的交易大厅，还有大行复古的外观，以及正门外高耸的无言的华佗像和象征滚滚财源的石球。

如果说，第二次搬迁后产生的影响已经实现了扩大了药都声望、稳固亳州药都地位的目的，那么，原定于2012年7月1日起开始进行的第三次搬迁，则必将进一步推动亳州药都地位的发展。2010年4月，康美药业以1.68亿元的价格收购了目前的大行，旋即投资了15亿元，着力大手笔打造位于亳州南部新区的康美（亳州）华佗国际中药城。该项目计划用地总面积约为1500亩，总建筑面积122.1万平方米。搬迁后，新大行的面积相当于大行当下交易大厅面积的三倍。^③如此一来，亳州必然成为国内中药材的集散航母，愈加当之无愧为四大药都之首。

然而，形象的建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2003年“非典”时期，亳州就因假药贩卖被央视曝光而差点破相。当力图呈现的空间形象，和实际呈现的空间形象之间出现差异时，要保证象征资本的持续积聚，就必须进行弥合。在笔者看来，这种弥合不过是种表演。因为在切实的利益面前，弥合的方式不是进行伤筋动骨式的治疗，而是“擦脂抹粉”式的遮蔽。仍以查假、打假为例。非典后，亳州开展了官方语境下的史无前例的整顿。这次整顿确实是史无前例，因为据说，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自古以来从没有停止运转过。然而非典后，大行关闭，所有场外市场也都关门歇业，而且时间长达一个月。这次整顿也确实是让药商们刻骨铭心。

^① 见亳州市政府关于呈报《安徽省亳州市中药材产业化示范区实施方案的通知》。

^② 同上。

^③ 见安徽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http://www.ada.gov.cn/>。

因为药商停业一天，损失就成千上万。亳州正是要以亿元的经济损失为代价，来重树人们对亳州的信心，重树形象。不能说这次整顿没有效果，但是它的表演性就在于问题的解决并没有出现质的改变。之所以没有“质”的改变，是因为场外，这种制假售假的栖息地自身的主体地位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在国家面前，亳州是一个休戚与共的统一体。在亳州，药材是地方发展的安身立命之本，亳州全市有 100 多万人从事药品药材经营。^①药业带动了整个亳州第三产业的发展，例如住宿、餐饮、娱乐休闲等。虽不及牵一发动全身，但是药材行业的兴衰也势必会影响到其他行业的利润实现。亳州处于一个整个的利益链条之内。查假之所以演变成表演，就在于它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无法把市场盘的过死。于是，即使不是作为表演者直接参与表演，也是作为协助者间接参与表演。水至清则无鱼。这种情况下，国家不能在场，必须缺场。

场内忙于建构形象，弥合形象差异，积聚象征资本，场外只要“坐享其成”就可以了。声望这种象征资本一旦生成，无论场外还是场内，无论个体做没做过贡献，都可以享受由它带来的各种好处。谁对声望进行消费都不会减少其他人对它的消费；声望一旦被提供，也没有谁会被排除在对它消费之外。类似于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旨在以“搭便车”理论试图揭示的道理一样，场外在搭场内的便车。也许区别在于奥尔森试图揭示的，是一个理性人在集体行动中的非理性。而场外所做的，却恰恰是一个“没理”的空间在集体行动中最理性的行为。

讨论与结语

历经多年的辛苦经营，亳州——这个当下，中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中心，终于成功的发展到了买全国、卖全国的格局。亳州药商们经常自豪的说：“买不到的药材来亳州管买到，卖不掉的药材在亳州管卖掉”；“有药材的地方，就有我们亳州人。”但是，所有这一切的获得，并非完全是出自一种自在演进的结果。在其中，除了政府角色，我们能看到的，还有很多空间与地方交互作用的身影。

空间是地方化的空间，不同地方，空间的特质也不同。例如，从历史上看，同是作为药都，亳州药市空间起于涡河水运的自然条件，而安国则是起于药王庙修建后引发的庙会影响。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由于涡河上游河南引黄淤灌，加之水土流失，致使涡河河道淤积严重。昔日条件已逝。亳州无法再上演帆樯林立构锁钥的辉煌。药市要想发展，必然会演化出其他的路数。因此，无论是出于自为式的生成，还是他为式的生成，空间都与地方特质都一脉相承。此外，作为一个物理空间，大行的设立对地方发展的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使其个体经营方面存在了场内、场外之分。亳州药市的个体经营一向以场外为主。然而，在中药行业集约化发展的今天，场外已然由“合理”转变为了“没理”，甚至可以说，由“合法”转变为了“非法”。那么，亳州药市要想进一步发展，必须名正言顺，合理合法。场内、场外之分，即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由此，合理合法的场内成为万众瞩目之地。场外这个主体只要搭场内的便车就可以了。

^① 同上。

由此，地方是对空间的建构和利用。地方因此也是空间化的地方。大行在政府的干预下，俨然变成了一个象征物。它可以因为象征资本的积聚，改变资本的流向，生成新的交易秩序。场内积聚象征资本，场外搭场内的便车，这即是亳州药都经济的运作逻辑。因而，和汪民安的表意相似：空间既是手段，又是目标。地方在创造了空间的同时，也受到空间的建构与规制。这就是空间与地方的辩证关系。^[32]空间与地方的互构，完全可以成为地方增强其在地性，以此回应全球化的一种“地方再造”手段。“通过对‘地方’的个性化塑造，来强化地方给予外界的印象，用阿帕杜莱(A.Appadurai)的话来说，此即是所谓‘地方性’的生产(production of locality)。”^[33]

经由空间与地方的互构，亳州药都地位得到了稳固发展。然而事情并非就这么简单。再多走一步，依据列斐伏尔“空间的实践”、“空间的表征”与“表征的空间”的表述，我们还可以从中看到一种列式所言的空间的生产。

从亳州市整体的空间方位上看，大行的三次搬迁是一个不断南移的过程。这同时也是亳州城市化不断推进，亳州市区范围不断扩大的过程。大行选址处，自然环境、公共设施建设等都有了质的改变。村庄变城市，良田建楼房。这些物质空间的建构，都是以那些享有话语权的精英群体的“空间的表征”为指导的结果，受其空间想象的规制，为其修正。然而，这种城市化的过程，也是对弱者进行不断驱赶的过程。失地农民丧失的不仅是土地，还有传统的生存方式，以及在这个空间格局中本该具有的位置。当然，一个城市的“空间的表征”总是以享有话语权的精英群体为主导。但是“专家”们的构想并不一定就能生产出理想的药市空间。面对场外市场一些屡禁不止的实际情况，地方政府只能默许。多种群体在参与空间表征的冲突。只是，在这种冲突中，弱者只能被动体验。他们被驱赶，被支配的事实，他们真实的生活样态，早已被空间的实践所掩盖。

所以，人们扎堆来此从事生意，是因为人们自以为来亳州能赚钱，自以为卖某种药材能赚钱。殊不知，他们都被卷入进了权力的关系中。空间一旦实现了自身的生产，就必然会规训人的身体，迫使人们去遵从。表面上，药市格局异彩纷呈，人们都是自己生活的主导。然而实际上，空间的生产不仅使个体各就各位，还决定了他的姿态。人们和空间的关系，在空间中的位置，都含有政治象征的意味。^[34]好在正如赵莉华在阐述列斐伏尔的思想时所说的：“在‘空间表征’的渗透和制约下，‘空间实践’常常体现为规约的空间行为，但不排除对规约的逾越，两种空间行为分别产生两种‘表征空间’：规约‘表征空间’和挑战性‘表征空间’。”^[35]因此，空间生产下的抗争也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并给予探讨的。

作者简介：

傅琦，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研究所，在读博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 (美)爱德华·苏贾，后现代地理学[M]，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2] Setha M. Low and Denise Lawrence-Zunigas.(2003) The Anthropology of Space and Place: Locating Culture (Blackwell Readers in Anthropology. Malden: Blackwell.

[3][7][8][9] 陆扬，空间和地方的后现代维度[J]. 学术研究，2009，(3)。

[4][12] Atkinson, David, Jackson Peter, Sibley David and Washbourne Neil. (2005) Cultural Geography: A Critical Dictionary of Key Concepts. New York: I.B. Tauris.

-
- [5] (英)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M], 田禾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 [6] 章仁彪、李春敏, 大卫·哈维的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探析[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 (1).
- [10] 艾少伟、苗长虹, 从“地方空间”、“流动空间”到“行动者网络空间”: ANT 视角[J]. 人文地理, 2010, (2).
- [11] 庄春萍、张建新, 地方认同: 将“地方”纳入“自我”认同结构[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2-04-18.
- [13] 转引自王晓磊, “社会空间”的概念界说与本质特征[J]. 理论与现代化, 2010, (1).
- [14] 司敏, “社会空间视角”: 当代城市社会学研究的新视角[J]. 社会, 2004, (5).
- [15][16] 吴飞, “空间实践”与诗意的抵抗——解读米歇尔·德塞图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J]. 社会学研究, 2009, (2).
- [17][32][34] 汪民安, “空间生产的政治经济学”[J]. 国外理论动态, 2006, (1).
- [18][22][27] 亳州市志(1996版), 亳州市谯城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 [19][20][21] 亳州老城, 政协亳州市谯城区委员会编, 2005.
- [23] 李林艳, 关系、权力与市场: 中国房地产业的社会学研究[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 [24] 亳州市志(1987—2000), 亳州市谯城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 [25] 王华, 空间的底边与底边的空间——对南京安德门民工就业市场的研究[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1, (5).
- [28][29][33] 范可, “再地方化”与象征资本——一个闽南回族社区近年来的若干建筑表现[J]. 开放时代, 2005, (2).
- [30] 转引自何林军的博士论文, 意义与超越——西方象征理论研究, 复旦大学, 2004年.
- [31] 刘刻, 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空间维度[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09, (2).
- [35] 赵莉华, 空间政治与“空间三一论”[J]. 社会科学家, 2011, (5).